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华北伪政权 史稿

从“临时政府”到“华北
政务委员会”

郭贵儒 张同乐 封汉章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

华北伪政权史稿

从“临时政府”到
“华北政务委员会”

郭贵儒 张同乐 封汉章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华北伪政权史稿：从“临时政府”到“华北政务委员会” / 郭贵儒，张同乐，封汉章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7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ISBN 978 - 7 - 80230 - 571 - 7

I. 华... II. ①郭... ②张... ③封... III. 华北政务委员会 - 史料 IV. K265.63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0437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伪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第一、四
任委员长 王克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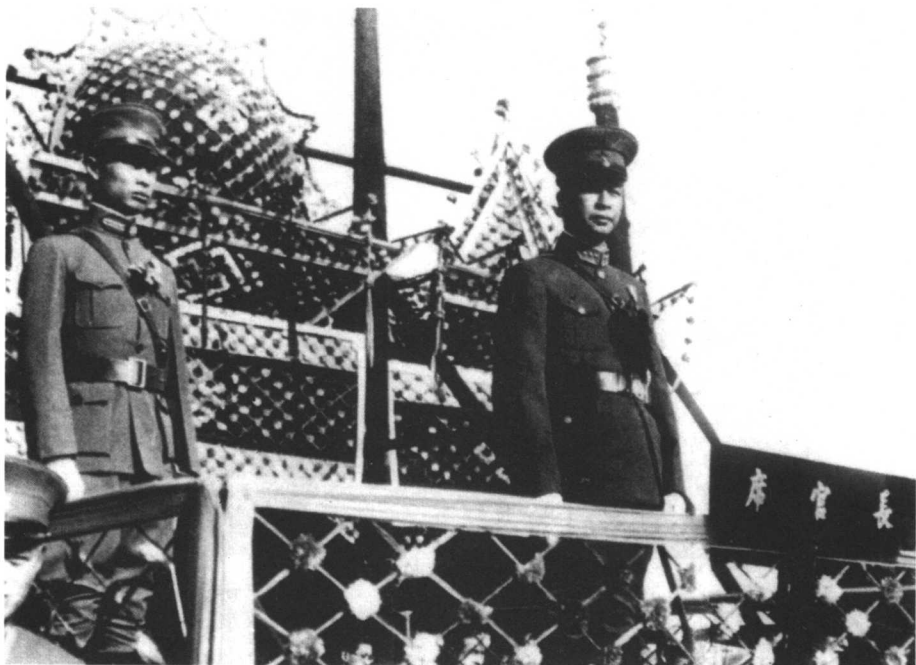
伪临时政府内务部总长、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第二
任委员长 王揖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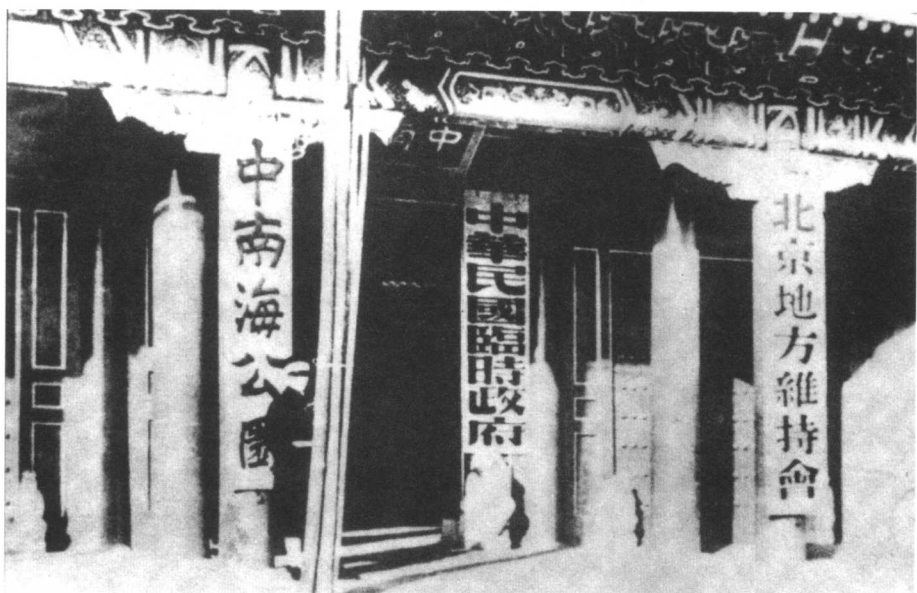
伪临时政府法部总长、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第三
任委员长 朱深



伪临时政府实业部总长、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第五
任委员长 王荫泰



1935年11月25日，日本扶植汉奸殷汝耕在通县宣布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图为“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举行成立大会时，殷汝耕（右）站在“长官席”上。



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伪北京地方维持会所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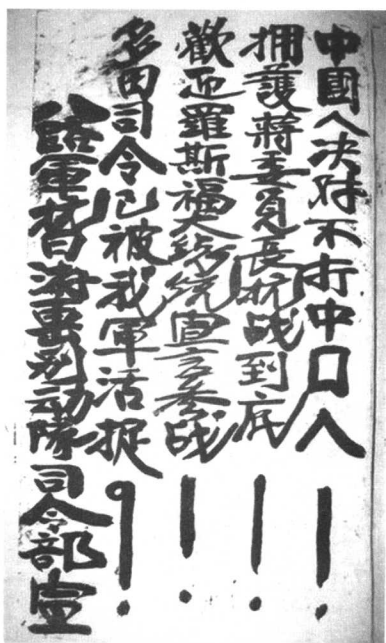
1937年12月16日王克敏等伪临时政府要人赴天津晤访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前排左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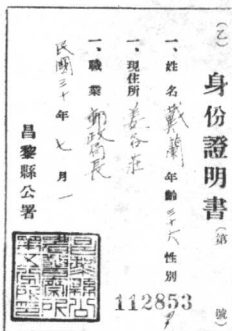
1937年12月24日，王克敏（前排右7）等在“新民会首都指导部”成立大会上与日本侵略者合影



1940年1月，在日本人的策划撮合下，汉奸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举行青岛会谈，决定成立以汪精卫为首的南京伪国民政府。图为汪精卫（中）与王克敏（左）、梁鸿志（右）在青岛。



伪北京市警察局检获的抗日传单



日伪时期身份证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编辑出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名单

顾问 王忍之 郭永才

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任 何秉孟

委员 蔡文兰 孙 新 谢寿光 徐辉琪
王 正 杨 群 徐思彦

执行编委 王 正 杨 群

编 务 周颖昕 李 敏

学术委员会

主任 张海鹏

委员 王桧林 王效贤 关 捷 刘楠来 张宪文
张振鹞 胡德坤 黄美真 解学诗

总 序

王忍之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为了进一步推进中日关系史以及抗日战争史的学术研究，为了以历史事实教育中日两国的年轻一代，主持编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1995年8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的村山富市在内阁发表讲话，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同年，日本政府实施为期十年以亚洲邻国为主要对象的“和平交流计划”。作为该计划的一环，日本外务省决定在日中友好会馆内设立日中历史研究中心，并且希望我国提供协助。中日双方有关部门通过协商方式确认了如下原则：在切实遵守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和精神、承认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战争这一历史事实的前提下，中方同意接受日方的要求，提供必要的协助。中国社会科学院接受我国外交部的委托，作为协助日方研究的中方窗口，与日方联络、协调相关事宜。

1997年8月，日中友好会馆致函中国社会科学院，再次要求就协助进行历史研究问题进行协商，提出“只有作为受害者、抵抗者中国的参与，历史研究事业才能达到所期的目的。这点正是需要中国协助的”。日中友好会馆还表示，愿意将该馆的相关

经费拨出一小部分交中方使用。经过协商，基本上达成了一致认识。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正式建立了“中日历史研究课题”，通过课题指南形式，在国内公开招标研究者。课题招标范围在1874~1945年间，着重研究日本侵华的历史以及这一时期与此相关的中日历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对课题申请进行评审。经评审通过的课题，中日历史研究中心视各不同课题的内容、工作量的大小给予经费资助，以助成其研究计划。

这样的年度课题招标，从1998年起，每年进行一次，每次约有15~20项课题申请得到通过。最早通过的课题，有的已经完成，并通过了结项手续。为了反映中国学者有关近代中日关系历史的研究成果，使它能被社会所了解，充分发挥它进行学术探讨、揭示历史真实的作用，以便今天的青年一代了解在中日关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些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巨大创痛的事件，我们决定从这些成果中选择一部分出版，总题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同时，文库也包容了国内学者撰著的一些涉及中日关系的著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力图向中国年轻一代，也向日本年轻一代提供认识历史本来面貌的真实材料，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希望所谓历史认识问题不再成为改善中日关系的一大障碍，希望中日关系向着睦邻合作、和平共处的方向发展，真正发挥东亚两个近邻国家之间经济上互补互助、文化上互相学习尊重的精神，在难免发生矛盾和冲突时，永远不诉诸战争。

是为序。

前 言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和伪政权的历史，是日本殖民地化中国的历史，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汉奸反动派相互勾结、沆瀣一气，对沦陷区人民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的历史，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约占全国领土 1/3 的沦陷区是抗战时期中国的三大基本区域之一，日伪在沦陷区殖民统治的长消直接影响着抗日战争的进程，因此对沦陷区和伪政权的历史加以研究，是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课题。

在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两年多后，毛泽东就强调了研究沦陷区问题的重要意义和迫切性。毛泽东指出，中国沦陷区问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生死问题”，是“抗战第二阶段——敌我相持阶段的极端严重的问题”。利用伪政权经营沦陷区，是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行军事进攻的同时，更加注重政治进攻和经济进攻的主要策略手段和表现，因此，“沦陷区问题的研究是刻不容缓了”。^①毛泽东还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有敌人的一面与我们的，在我们一面，“是如何支持游击战争的问题”；在敌人的

^① 毛泽东：《研究沦陷区》，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第2页。另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248页。

一面，“是敌人在沦陷区已经干了些什么并将要怎样干”。毛泽东特别指出：“研究这个问题，乃是研究前一问题的起点，不了解敌人的情况我们对付它的方法是无从说起的。”毛泽东还强调，鉴于抗战干部中“十人而九”对这个问题“没有研究或没有系统研究”，“这就指明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唤起注意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了”。^① 1939年10月1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社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一书写的这篇《研究沦陷区》序言，对研究沦陷区、伪政权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作了深刻而明确的阐述，对我们现在认识和研究沦陷区问题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在中共中央的倡导和支持下，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很快编辑出版了一套“时事问题丛书”，分为日本问题、沦陷区问题、国际问题、抗战的中国问题等几个方面。这套丛书出版后，对抗日根据地广大干部群众了解日伪的统治政策和罪行颇有助益。与此同时，抗日根据地以及国民政府统治区的各种报刊也加强了对沦陷区日伪统治状况的报道，揭露和抨击日伪殖民统治罪行，激励民众的抗日斗志。可以说，从全国抗战爆发后不久，中国抗日区域有关部门对沦陷区、伪政权的研究即已开始，并成为抗战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50~70年代，对抗战时期沦陷区和伪政权的研究一度受到冷落，但诚如有学者所言，这一时期对该领域的研究也绝非“一片荒漠”^②，还是取得了某些分散的成果。20世纪80年

① 毛泽东：《研究沦陷区》，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第2页。另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48页。

② 余子道：《回眸与展望：建国以来的沦陷区和伪政权研究》，《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3期。

代以降，随着“左”倾思想禁锢的打破和学术研究氛围的逐步宽松化，抗战史研究很快改变了只重视解放区而轻视其他区域的状况，研究领域迅速拓宽，研究内容不断深入，学术观点屡有创新。即以从前备受忽视的沦陷区、伪政权的研究来看，近20年所取得的进展也是颇为惊人的。不仅有大量的档案文献资料相继出版，而且有关沦陷区、伪政权的学术专著、学术论文以及人物传记等研究成果均大量涌现，呈现出一派繁盛景象。而在对东北、华北、华中和华南三大沦陷区研究上，尤以对华中华南、东北沦陷区和伪政权的研究更为充分，成果更加显著，无论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占有明显的优势，并形成了比较集中颇有影响的研究群体。^①

相对而言，学术界对华北沦陷区和伪政权的研究则显得比较薄弱。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类似《汪伪政权史资料选编》、《伪满史料丛书》这样的有关华北沦陷区伪政权的大型文献资料还未有出版，专题研究论文也不多见，有关华北伪政权和华北奸伪人物的研究还处于萌动状态。对沦陷区、伪政权研究这种不平衡的状态，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许多学者纷纷呼吁加强对华北沦陷区、伪政权的研究，以弥补抗战史研究这一薄弱环节。^②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学者开始把研究视线转向华北沦陷区和伪政权问题。自抗战胜利50周年前后开始的10年间，有关华北沦陷区伪政权的研究成果渐呈上升之势，有关该领域研究的

① 参见余子道《回眸与展望：建国以来的沦陷区和伪政权研究》，《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3期。

② 余子道：《回眸与展望：建国以来的沦陷区和伪政权研究》，《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3期。另参见郭德宏主编《抗日战争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第178页。

局面正在打开。

首先是相继出版了一些重要文献资料。除 80 年代末出版的《日伪在北京地区的五次强化治安运动》（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 年）、《日伪北京新民会》（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年）之外，90 年代以来又相继出版了《冀东日伪政权》（南开大学历史系、唐山市档案馆编，档案出版社，1992 年），《日本侵华罪行实证》（北京市档案馆选编，人民出版社，1995 年），《日本对华北经济的掠夺和统制——华北沦陷区经济资料选编》（居之芬主编，北京出版社，1995 年），《抗日战争》第 6 卷《日伪政权与沦陷区》（章伯锋、庄建平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 年），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中的《华北自治运动》、《华北治安强化运动》、《华北大“扫荡”》（中华书局，1997 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选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日伪在沦陷区的统治》（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年），季啸风、沈友益主编的《中华民国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天津市档案馆选编的《日本帝国主义在天津的殖民统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年），居之芬、庄建平主编的《日本掠夺华北强制劳工档案史料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等，这些重要文献资料的出版为我们研究华北沦陷区和伪政权，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基础。《历史档案》、《民国档案》、《北京档案史料》等刊物也陆续刊发了一些有关华北日伪统治的档案史料。此外，全国政协和各地政协陆续出版的文史资料，也有涉及华北沦陷区、伪政权的内容，近来中国文史出版社把这些分散的口述史料汇编成《我所知道的伪华北政权》一

书，给读者和研究人员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其次是涌现一批重要研究成果，对华北沦陷区伪政权的研究正逐步深化。总体来说，这些成果多集中于华北日伪政治统治、经济掠夺、思想奴化等诸方面。在华北日伪政治统治方面，这些成果多涉及华北日伪统治机构、统治策略和措施等问题。如费正、李作民、张家骥合撰的《抗战时期的伪政权》（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一书，辟有专章对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作了简明扼要地论述。蔡德金的《历史的怪胎——汪伪国民政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也在部分章节中对平津伪地方维持会、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历史作了介绍。张炳如的《华北敌伪政权的建立和解体》（《文史资料选辑》第39辑）、王琳的《对抗战时期华北伪政权的考察》（《延安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田苏苏的《伪华北临时政府始末》（《河北文史资料》第28辑）等文，对伪临时政府和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建立和衰亡进行了考察和论述。李秉新等主编的《侵华日军暴行总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何天义主编的《华北劳工协会罪恶史》（新华出版社，1995年）、《石家庄集中营》（新华出版社，1995年），陈平的《千里“无人区”》（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台北李恩涵的《战时日本贩毒与“三光作战”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等书，以及谢忠厚的《华北甲第一八五五细菌战部队之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居之芬的《二次大战期间日本使用中国强制劳工人数初考》（《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1期）和徐勇的《侵华日军驻北平及华北各地细菌部队研究概论》（《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等论文，则有力揭露了华北日伪各项暴行。

关于日伪华北四省、三特别市等地方伪政权的研究也取得一些成果。如：邵云瑞等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的前前后后》（《南开大学学报》1986年第6期），傅清沛的《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对青岛的殖民统治与掠夺》（《山东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王第荣的《日伪时期青岛见闻之点滴》（青岛《文史资料》第4辑，1983年），王士花的《日伪时期华北农村的县级政权》（《青年学术论坛·2001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吴根樑的《日本土肥原机关的“吴佩孚工作”及其破产》（《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朱德新的《略论日伪对冀东农村基层行政人员的控制》（《中山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张宗平的《日伪在北平沦陷区的残暴统治》（《北京党史研究》1995年第5期），赵红的《北平沦陷时期的地方维持会》（《北京档案史料》1987年第2期），北京市政协编写的《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北京出版社，1987年），北京市政协编写的《日伪统治下的北京郊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朱德新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甲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刘大可等的《日本侵略山东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侵华日军在山西的暴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牛新田的《山西日伪政权的建立和覆灭》（《山西文史资料》第41辑），邢汉三的《日伪统治河南见闻录》（河南大学出版社，1986年），天津市政协编写的《沦陷时期的天津》（津新图准印号：001542，1992年）等著述，对各省市日伪政治统治情况也有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徐立刚的《伪临时政府与伪维新政府政治关系演变浅析》（《民国档案》1996年第11期）、问昕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与南京伪中央的对抗》（《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则